

宁夏博物馆藏西夏文物

陈永耘 (宁夏博物馆 750001)



[摘要]

本文结合馆藏文物的特色,从西夏文字、西夏工艺、西夏佛教、西夏建筑四个主要方面入手,生动而详实地揭示了西夏文化的独特魅力,揭开了西夏王朝的神秘面纱,进一步向世人展示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关键词: 西夏 文物 文化

党项人是羌族的一支,早期生活在我国西北青海一带,后逐渐内迁至今宁夏、甘肃地区,依附于唐王朝,并在长期掌控夏州地方政权的过程中强大起来。公元1038年,党项首领元昊建国称帝,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因其在宋朝西北方,中原地区习惯称之为“西夏”。西夏疆域范围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大部、陕西北部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地区,先后与两宋、辽、金对峙鼎立,共历十主,历时189年。西夏地处中西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上,形成了一种受中原汉文化影响为主的多元文化,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很强的民族特色。由于历史的变迁,西夏灭亡时,大量的文物、典籍等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在其后的数百年中,西

夏的历史文化逐渐被湮没,直到1804年,甘肃著名乾嘉派学者张澍在其故乡凉州(今甘肃武威)发现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即名声日著的“西夏碑”)这件极具考古价值的西夏文物之后,碑上如若天书般的文字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其渊源在相隔数百年之后被人们重新探识,西夏古国由此仿若初遭洞开的一方谜阵,令无数先贤学者痴迷忘返。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夏古都兴庆府,西夏的故地宁夏、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甘肃河西、青海东部等广大地区,都有西夏遗址、文物、文献的重要发现。西夏学也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显学。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彰显西夏故都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使独具魅力的西夏文化重

回人们的视野,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于2002年8月隆重推出了《西夏文物精品展》。该展览集中了馆藏西夏文物精品百余件(套),历时四年之久,展览中所展示的西夏文化——无论是方正繁缛的西夏文字、美仑美奂的金属制品,还是气势恢弘的佛教建筑、精湛超群的石雕技艺,都引起了专家、学者和观众的极大关注和兴趣。结合宁夏博物馆藏的西夏文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揭示西夏文化的特点:

一 西夏文字

西夏文字曾一度被人们称为死文字,它是在借鉴了有几千年发展历史的汉字的基础上,在西夏开国皇帝元昊倡导下,由大臣野利仁荣主持创制完成的,共6000多字。无论纸质、石质,还是铜质,抑或竹木类文物共同反映出,西夏文字和汉字在形体上确很相象,但又有不同于汉字的特点。从文字构成上,它可分为单纯字和合体字两大类。西夏文字笔画大多在十画以上,撇捺等斜笔较多,结构均匀饱满,左右平衡,格局周正,形似方块,字由点、横、竖、撇、捺、拐、提等笔画组成,有比较完整的构成体系和规律,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其应用范围十分广泛,从官署文书、法律条令、审案记录、买卖文契到文学著作、历史书籍、字典辞书、碑刻、印章、符牌、钱币以及译自汉藏文的佛经。西夏文字在整个西夏

时期,从未间断过使用。即使其灭亡后,仍在一定范围内延续使用至明朝中期。它不仅是西夏文化的精华所在,为西夏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亦成为今人探寻西夏后裔踪迹的有力佐证。

西夏文雕版主要出土于黑水城、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其中宏佛塔出土最多,约2000余块。宏佛塔出土的西夏文木质雕版经过火烧后,虽然炭化变黑,成为大小不同的残块,但是文字大都尚可辨识;有的单面有字,有的双面有字,雕版版式和字号大小不一,种类较多。根据所出土雕版文字大小的不同,可将其分为大、中、小号字版。大号字版(纵13.7、横23.3、厚2厘米),版上每字1-1.2厘米见方,字体方正,表面整齐平滑,刻工娴熟有力。版面中间有宽1厘米的中缝,中缝两侧各竖刻六行西夏文字,其中最上一行残存十个西夏文字,行距0.6-0.8厘米,字距0.1厘米,中缝上亦刻有三个西夏文字,较版面上字略小,雕版背面平整无字。这类雕版发现较少,共7块。此块残版是宏佛塔所发现的两千多块残版中最大的,也是唯一没有全部炭化变黑的一块,现为一级文物,藏于宁夏博物馆。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出土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县金山乡贺兰山拜寺沟内十余公里处,经整理拼对,得出九本。其为刻本,白麻纸精印,蝴蝶装。完本者有封皮、扉页,封皮左上侧贴有刻印的长条书签,书名外环以边框,封皮纸略厚,呈土黄色,封皮里侧另背一纸,有的纸为佛经废页,背时字面向内。全页版框纵30.7、横38.0厘米,四界有子母栏,栏距上下23.5厘米,无界格,半面左右15.2厘米。版心宽1.2厘米,无象鼻、鱼尾。上半为书名简称,下半为页码,页码有汉文、西夏文、汉夏合文三种形式。每半面10行,每行22字,每字大小1厘米左右。通篇字体繁复、周正、秀美。字体笔画流畅,边缘整齐,少有断笔、缺笔现象,印制精良,具有木活字版印本特点,与泥活字版有明显区别。另外,有些字行间有长短不一的线条,是木活字印刷特有的隔行加条痕迹。这说明元代王祜“造活字印书法”中提到的“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



大号字木雕版



西夏文残碑



西夏文寿陵残碑

之”的技术,早在西夏时期就已经出现并熟练地使用。在宋元时期的活字印刷品未能流传于世的情况下,与宋朝同时的西夏活字印本的发现,在活字印刷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已有七八百年历史的古活字版书籍,填补了活字印刷史上的这段空白,是中国乃至世界研究活字印刷的最宝贵的实物资料,它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提早了一个朝代,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西夏文草书长卷,纵 16 厘米,总幅宽 574 厘米,1991 年出土于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现藏于宁夏博物馆。原卷由九张白麻纸连接而成,有的字骑在两张纸接缝处,这表明是先将纸粘贴在一起,然后再书写的。全篇草书,甚难辨认。但字体笔法流畅,书写随意。整篇文字层次分明,段落清晰。全卷总计 324 行,约 7300 字,是现知最长的卷式西夏文文书,也是西夏文草书书法作品的佳作。西夏文草书与汉文草书的书写规律相似,其笔势飞动雄健,有汉字草书“简而动”、“流而畅”的特点。点画间每以牵丝映带,形逐势生,“借上字之末,而为下字之始,奇形离合,数意兼包”。捺笔下笔重,能看出其中章草的意味和特点。从西夏文草书用笔及分行布白的章法来看,的确有气韵生动的鲜明特点,粗犷豪放的强烈个性。它是研究西夏文字及其书法艺术弥足珍贵的资料,其淋漓酣畅的笔势和气韵也是耐人寻味的。



西夏铜印

西夏文残碑,石质,纵 22.5、横 27 厘米,为西夏陵出土的形体较大、字数较多的一块西夏文碑。砂岩雕凿,阴刻楷书,所刻碑文笔画匀称,笔力遒劲厚重,是不可多得的西夏书法珍品。灵芝颂汉文残碑,石质,高 63.5 厘米,宽 20 厘米,厚 16.5 厘米,1975 年出土于宁夏银川

西夏陵区 7 号陵。西夏陵区 7 号陵东碑亭共出土残碑 510 块,均为汉文,每字边长 3 厘米,阴刻楷书,笔画工整,字体刚劲有力,有柳体之风,此碑为最大一块。文字内容为崇宗乾顺作《灵芝颂》一诗的残句,共 6 句,每句 4 字,碑文残存 3 行 31 字:“(灵)芝颂一首其辞曰 於皇 / 俟时效祉 择地腾芳 晕晔 / 德施率土 赉及多方”,四言一句,二句一韵,句法整齐,短促有力。

馆藏的几枚西夏文首领铜印,基本上是正方形,大小或 5 厘米左右见方,或长宽略有差异。迄今所见官印,印文有三种:即二字印、四字印和六字印,其中绝大多数为二字官印。印文使用屈曲盘回之西夏文白文(阴文)九叠篆字,字体繁复,圆润秀美,刀法娴熟稳健,笔画刻至印章四角处,能随印的自然角度而灵活变化,达到了既方正遒劲,又自然天成的境地。从其特点来看,还是受到了汉文印章中九叠篆书的影响。

二 西夏工艺

西夏建国前后,党项族不断吸收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发展自己的农业、手工业,西夏政府设有文思院、绢织院、首饰院、铁工院、砖瓦院、金作司等专门机构,从事相关手工业的生产和管理,西夏工艺也由此得到提高并形成了特有的民族风格。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鎏金铜牛,是西夏工艺的典范之作。该铜牛于 1977 年在宁夏银川西夏陵区出土。长 120、宽 38、高 45 厘米,重 188 千克。由青铜铸造而成,中间是空心,外表通体鎏金。牛屈肢而卧,双眸远眺,四肢有力,肌肉突出,体态健壮,形象生动,比例匀称,线条流畅,制作时需要将冶炼、模具雕



鎏金铜牛

塑、浇铸、抛光和鎏金等数种工艺集于一体,是西夏金属铸造工艺集大成者,真实地反映出西夏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西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据史料记载,西夏甲冑“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西夏刀、剑的制作也非常出色,“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能及”;“就连宋钦宗本人也常佩带夏国剑”。馆藏的天下第一剑——西夏铁剑,长 88.2 厘米、柄宽 6.3 厘米,1975 年于宁夏银川西夏陵区 6 号陵出土。虽然历经数百年而锈迹斑斑,但依然可以感知它曾经在刀光剑影中的风采。

西夏的金属铸造业非常发达,不仅能生产质地精良的武器和农具,还能制造出造型优美、纹饰复杂、外表光莹、工艺精湛的金银器。西夏的金银器制造工艺水平很高,主要为达官贵族垄断和占有。政府机构中专门设有“文思院”,其职能是“掌管金银犀玉,金彩绘素,以供舆辇册宝之用”。1975 年宁夏银川西夏陵区 6 号陵出土的荔枝纹金牌饰(长 5、宽 2.1、厚 0.4 厘米、重 11.7 克),通体呈长方形,用纯金捶碟而成,四周压出凸棱边框,正面凸出三组荔枝果及枝叶纹,底为圆点纹,背面左右两端各有一横穿。它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纯金工艺品,表现出了西夏时期高超的铸造工艺。嵌松石银菊花饰(长 4、宽 2.8 厘米、重 2.7 克),银质,椭圆形。表面鎏金,中间花蕊处原镶嵌有绿松石,周围为连珠及卷草纹,边饰莲花瓣纹。该器物为西夏人帽子的一个装饰物件,其精细的做工,反映了西夏金银器制造已经有锻、压、镶嵌、鎏金、抛光等多方面的技术。据《宋史·夏国传》载: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西夏



西夏钱币

“始立通济监铸钱”,这是关于西夏设立铸钱机构的最早记录。但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西夏文钱币是“福圣宝钱”(1053-1056),说明西夏在设立铸钱机构以前已铸造少量钱币。故此馆藏的福圣宝钱(已知最早西夏钱币)和大安宝钱(钱直径 2.3-2.5 厘米),铜质,皆为西夏文右旋读小平钱,显得弥足珍贵。西夏钱币铸工精细,轮廓规整,钱文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遒劲秀美,币材有铜质和铁质,成色较高,优于同时代的辽钱和金钱,可与宋钱媲美。

西夏地处我国西北,多高山与荒漠,地理环境恶劣,金属矿藏相对中原要贫乏。为了摆脱这一困境,西夏大力发展制瓷业。西夏陶瓷器虽不甚精美,但在器型和纹饰上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西夏瓷器在釉色上,以黑、白、褐三色为主,其装饰多采用点彩、捏塑、剔刻花等工艺,在剔刻花制品中,尤以牡丹、菊花、芍药、莲花等花卉纹饰为主要题材。瓷骆驼、瓷扁壶、高足碗、白瓷豆、剔刻花经瓶等在西夏瓷器中极具代表性。褐釉四系瓷扁壶(高 19、腹径 35 厘米,宁夏西吉县三合乡出土)、素面褐釉双耳瓷扁壶(通高 32.8、腹径 29.5、厚 16.5 厘米)、黑釉剔刻花四系扁壶(高 35.4、直径 31.6、厚 17.3 厘米)等几件造型特异的瓷扁壶,是西夏瓷器中常见的器物。其制作精美,产量较大。扁壶的两侧,通常有双耳或四耳,以便穿绳提拿或携带,其造型可能从游牧民族盛水的皮囊演变而来。有的壶腹部正反两面各有一圈足,正面圈足有对称和加固胎体的作用,背面圈足起放置平稳的作用;有的只有一侧有圈足;有的小型扁壶则没有圈足。党项民族长期生活于马背之上,能耐寒暑饥渴,长于骑射,而扁壶体态

轻盈，形状非常适合在马背或驼背上吊挂携带，是西夏人所喜爱的用于装水、盛奶、灌酒的生活用具，因此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它们也更加有力地证实了马背文明的独特魅力。

党项族是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畜牧业发达，所以，毛纺织业具有悠久的历史。丝织业作为中原地区的传统手工业，宋代已有很高的水平。西夏一方面通过宋朝每年的“岁赐”以及贸易进口获得大量丝织品，另一方面也逐步发展自己的丝织手工业。西夏建国后，政府机构中设置了“丝绢院”和“绣院”等，专门管理棉、丝和麻纺织业的生产，所出的丝织品有绢、纱、罗绮、绫、锦等。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有一些关于丝织生产工序的词语，如“缣丝、染丝线、锈线、纺线工”等，这说明西夏丝织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1986年宁夏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出土了两件印婴戏莲纹绢，尺寸分别为长30、宽84；长29.7、宽87厘米。该两块印花绢图案完全相同，为童子戏花图。图中的花纹采用连续纹样，其基本构图是一排圆形花环内绘有四朵小白花，环外绘一周连珠纹；另一排是菱形花框内绘有四朵小白花，花框与花环错位排列。花框四边各有一戏花童子。童子的造型和大小完全一样，戴有桃形项圈和环状手镯，肚皮上围一块黄色肚兜，面相丰腴，肌体白胖，挺胸鼓腹，右手上举、左手下垂，各抓一枝条，双腿腾空跃起。虽相隔数百年，但两件丝织品的纹样、图案、色泽依然清晰可辨。

三 西夏佛教

西夏自元昊起历代统治者都极力推行佛教，形成了上下崇佛、寺庙林立、僧人众多、信徒广布的局面。虽然佛教是西夏统治者维护和巩固其政权的重要手段，但其极度的兴盛，却为不足二百年历史的西夏王国在其境内创造了辉煌的西夏佛教艺术。

宁夏宏佛塔出土的彩绘泥塑罗汉像、彩绘泥塑佛头像、彩绘泥塑佛面像、力士面像、彩绘绢质佛画、彩绘擦擦等，堪称西夏佛教的典型器物，现都为宁夏博物馆所藏。两尊造型完好的佛头像，极为相似，高36厘米，正面宽24.5厘米，侧面宽25厘米。

佛像头顶为螺髻，中间有一白色肉瘤。面部方颐，柳眉细眼，眉间有白毫。眼珠乌亮，为黑色釉料特制。下眼脸上有黑色泪痕，系眼珠釉料滴流所致。鼻梁高直，双唇闭合。唇上墨线绘八字胡，下颌用墨线绘出日、月、云状纹饰。面部曾经两次用白粉涂饰。头像中空。其面部表情恬静而庄重，具有犍陀螺造像艺术的古朴风格。丰腴、下巴圆润、眉如弯月、嘴唇短厚、圆而近方的脸型特征，是以当时人们公认的典型面相标准而塑造的，富有唐代造像遗风。彩绘泥塑力士面像，高13厘米，面宽12.5厘米。力士头发卷曲，双眉紧锁，双目圆凸，直鼻大嘴，面部肌肉隆凸有力，作威怒相。线条粗犷，技法纯熟。面像运用写实与艺术夸张相结合的手法，塑造出力士的威严形象，既保留有浓厚的唐宋遗风，又体现了西夏粗犷奔放的民族精神。彩绘擦擦，共5件，尺寸约在高7-13.4厘米之间，腹径4-7.4厘米之间。分上下两部分，下部圆形高基座，表面彩绘上下两层莲叶形图案，图案以白、浅蓝两色线勾边，以深蓝填充，色彩艳丽。上部呈圆锥形，模印四层共107座小佛塔，与大塔擦共组成108座佛塔，其下一周梵文，一周莲纹，上部残存涂金。在众多的素面擦擦中间，目前国内仅有的这几件彩绘擦擦，显得尤为珍贵。西夏佛塔中擦擦的大量发现，证实了藏传佛教在西夏盛行的史实。

宁夏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出土的竹木雕上乐金刚像、彩绘绢质《上乐金刚》唐卡及《上师图》唐卡、彩绘木雕供桌、花瓶及绢花等；以及由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出土的雕版印《顶髻尊圣佛母像》、《捺印佛画》等一批精美的佛教艺术品，充分体现出西夏中后期，由于与周边各地包括吐蕃的交流进一步加强，藏传佛教在西夏得以迅速传播和弘扬，所形成的显密兼修、汉藏结合的佛教思想和佛教艺术。竹木雕上乐金刚像（高15、座宽5.5、底座长10.4厘米），形象十分复杂。主尊金刚为裸体，身躯呈蓝色，四面十二臂，主臂拥抱明妃，双手各握一法器，其余十臂向两侧平伸，双足下踩仰、伏魔。明妃金刚亥母的面部和身躯呈红色。主尊身后雕成大象形状，呈白色。上乐金刚是藏密无上瑜伽修法中尊奉

的五大本尊之一。该塑像将藏传佛教上乐金刚修法中本尊、佛母的造型与装饰表现得淋漓尽致,人物造型生动,雕刻技艺娴熟,彩绘色泽艳丽,散发出将单纯与深奥微妙融为一体的奇异魅力。以炽盛光佛为题材的绘画,在敦煌石窟的唐代壁画中就已出现,是星占学与密教相结合的产物。其内容涉及佛教、道教、天文历法及中西文化交流的范畴。馆藏的两幅彩绘绢质佛画《炽盛光佛图》(尺寸分别为纵135、横78;纵121、横61.5厘米),画面内容丰富,布局严谨,色彩淡雅,线条流畅。人物形象世俗化,排列错落有致,神韵突出,继承了唐、五代佛教绘画雍容华贵的传统。由于西夏所处地理位置的多边等特点,各种绘画风格能在这里共存发展,在西夏佛教绘画中既有中原画风的影响,又有藏传佛教艺术的特征,这在馆藏的佛画及唐卡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西夏与同时期并存的两个少数民族政权辽、金都信仰佛教,辽、金只是分别整理、刻印了汉文《大藏经》,而西夏王朝则用西夏文翻译了三千六百卷佛经,为中国的《大藏经》增添了一种卷帙浩繁的少数民族文字的《大藏经》——西夏文《大藏经》。馆藏的《大方广佛华严经》(长31.7、宽12、厚1.9厘米)就是一例。该经为元代初期版本,木活字印刷,经折装,西夏文楷书,文字工整秀丽,油墨均匀干净,通体呈长方形,封面为黄色,上下边缘有修复的痕迹。它是研究西夏佛教、西夏文字及木活字印刷术的重要的实物资料。

从星罗棋布的佛塔寺庙,到举世闻名的莫高窟、榆林窟和黑水城遗址,无处不包含着建筑、石窟、雕塑、绘画等丰富多彩的西夏佛教艺术。而每一件精美的佛教艺术品,又无不体现了其神秘而又有地域性、多元而又不失民族性的特色。西夏佛教不仅是中国佛教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世界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极为珍贵的遗产。

四 西夏建筑

西夏建筑的遗存,主要有西夏城址、陵园、佛塔、寺庙和建筑构件。西夏佛塔在形体构造和修建

方式上呈现出种类繁多、富于变化的特征。砖木结构的佛塔,其形制有仿唐密檐式、仿宋楼阁式、仿藏覆钵式、复合变体式等。在塔建筑平面结构上有四方形、十字折角形、八角形、六角形、圆形等多种。就是在同类同种造型的佛塔中,塔身、塔檐、塔刹的砌筑与装饰处理手法上也是变化多端,显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和灵巧技艺。由于吸收了中原建筑的诸多建制风格,又颇受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西夏佛塔朴实简练的形体美更为亮丽突出,古朴的宗教气氛更为浓厚,形成了西夏佛教建筑的特色。西夏陵园建筑,除残损的塔式陵台和城墙断垣外,只有破碎的建筑构件,但就是这些遍地散落、形状各异的龙头兽角和断绿残红依然昭示出,这里曾耸立着装饰有走兽飞仙、碧瓦重檐的亭台楼阁。瓦当、滴水是西夏最为常见的建筑构件。花卉滴水、模印莲花、石榴果等,图案清晰,构图疏密得当,线条活泼生动,较瓦当装饰为佳。兽面滴水呈弧线三角形,兽面额头生角。双眉上挑,怒眼圆睁,毛发斜竖,嘴唇微合,露出两颗獠牙,面目狰狞。西夏陵区出土的滴水数量不计其数。其制作精美,纹样多富于变化。用于檐口,不仅可以遮朽,而且具有很好的装饰效果,集实用、美观于一身。这在唐、宋陵园的建筑构件中,是极难得到体现的。唐以后,地砖纹样一改往昔以动物为主要题材的传统,多用植物纹装饰,而西夏陵区出土的绿琉璃花纹方砖(长33、宽34、厚5.5厘米),中间饰有石榴花蔓草卷叶纹,是西夏时期一件极为珍贵的琉璃建筑材料。而鸱吻、套兽及迦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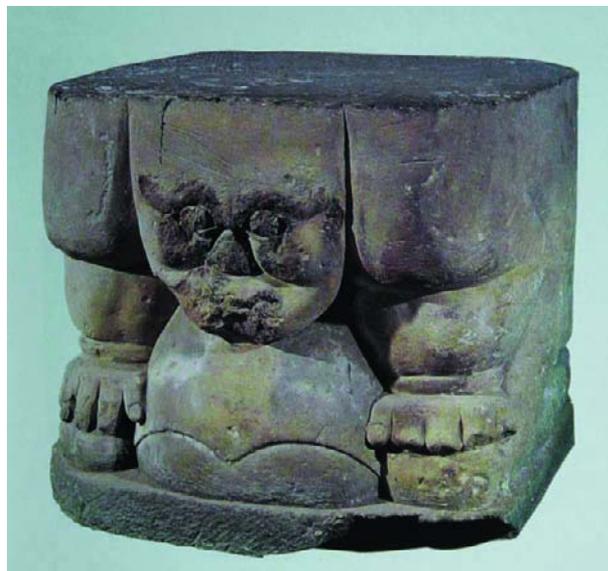


灰陶五角花冠迦陵频伽

频伽、摩羯、海狮等各种动物脊饰，却是西夏建筑构件中匠心独运的重彩之笔，其质地有琉璃、红陶、灰陶等，制法均采用分模形成的方法，模具的雕刻线条刻画或精细，或简洁粗犷，形象气势威猛生动。

2001年于宁夏西夏陵区3号陵出土了一批迦陵频伽，质地分别有琉璃、红陶、灰陶三种。灰陶迦陵频伽，长50厘米、宽35厘米、高45.3厘米。头戴四角叶纹花冠，面部浑圆，细眉长眼，双颌丰腴，眼睑略垂，以阴刻细线，突出眉眼，眼未睁，神态静谧安详；丰乳，双手作坚实心合掌印于胸前；羽翼丰满，状如大鹏展翅，长尾似蕉叶；双腿及爪跪骑于座，座底抹角方形，正面饰卷云纹弯曲于两侧。迦陵频伽在佛经中名曰美音鸟或妙音鸟，其形象多为人首鸟身，在佛教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它是通过其美妙的声音和优美的舞姿娱乐佛、供养佛，以达到“法音宣流”的目的。在宋人所著的《营造法式》中，有关于作为建筑脊饰的迦陵频伽的记载，但目前尚未有实物的发现。2001年在西夏陵区所发现的迦陵频伽，是以建筑构件的形式存在的，具有装饰效用，这一发现尚属首次。目前从西夏陵区出土的迦陵频伽的形态看，其形象应是延续了唐代的传统。它的流行，不仅主要集中在唐、辽两朝，还包括西夏。这也大大丰富了中国佛教艺术的内容，为研究佛教在西夏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佐证。

迄今，宁夏西夏陵区已出土了11件石雕力士志文支座，但刻有西夏文字的仅有一件。该支座于1974年出土，圆雕，白砂石质，近似正方体，为男性人像。面部浑圆，颧骨高突，粗眉上翘，双目圆睁且外凸，鼻梁短粗，獠牙外露，下颚置于胸前。裸体，腹有肚兜，肩与头齐，肘部后屈，双手托膝，下肢屈跪，背部平直。座顶左上角阴刻西夏文三行，计15个字。第一行4字汉译为“小虫旷负”，第二行4字汉译为“志文支座”，第三行7字汉译为“瞻行通雕写流行”。背部阴刻汉文一行6字“砌垒匠高世昌”，为西夏石雕工匠的姓名，弥足珍贵。整个石雕以夸张的手法表现了负重者的神态，反映出西夏时期石雕艺术的独特风格，为国宝级文物。至于支座的用途，有人根据其放置在碑亭中心，周围发现大量石



力士志文支座

碑残片，西夏陵一号陵所发现的支座顶面有方形榫眼等发掘资料，认为它是碑座；有人根据西夏陵碑亭遗址上发现的碎砖瓦及八号陵所出土的支座顶面无榫眼等发掘资料，断定支座是立木石础。支座究竟做何用途，尚待进一步的研究考证。

历史是不会消亡的。古老的文明总会以种种方式，向现代展示它的痕迹。13世纪，成吉思汗亲率蒙古铁骑六征西夏，却遭到顽强抵抗。有记载称，战死前，他下了三道灭绝西夏的诏令：灭绝西夏王、西夏族人、西夏文化。蒙古大军不光血洗了西夏，后来的元朝史家在修史叙事时也有意跳过西夏这一章，使之成了唯一没载入二十四史的王朝。西夏文明从此在历史的长河中销声匿迹，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一个王朝。宁夏博物馆馆藏西夏文物，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研究西夏史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通过西夏文字、西夏工艺、西夏佛教、西夏建筑等方面，把宁夏近几十年的考古成果精品展示给世人，揭开西夏王朝的神秘面纱，全面、真实地揭示西夏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示中华古文化的博大精深，让更多的观众认知尘封数百年的历史，感受历史文明中特别辉煌灿烂的一脉。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